

---

# 中國語境下的新聞專業主義社會話語<sup>1</sup>

童靜蓉

---

## 摘要

這篇文章運用社會建構的取徑研究中國語境下的新聞專業主義話語及其涵義。新聞專業主義是一種話語價值體系，同時也是在社會話語中為記者建構的職業身分。本文認為在中國有三個話語體系：機構(職業)話語，官方話語，以及民間話語。三種話語之間交叉重疊，其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在話語場境中互相對抗的各種權力的消長而改變。媒體以及新聞業在表達和實踐專業主義的時候經常要與社會脈絡中的各種權力進行協商。新聞專業主義並非絕對的利他性，相反，一些出於自身利益考慮的媒體機構以及新聞記者將之當作一種策略來使用，其本身是一種權力的來源。此外，在中國語境裏，專業主義話語被賦予和被理解成一種異於西方話語的話語。專業主義話語的表述，比如「承擔社會責任」，「自由度」，和「客觀性」，在中國這樣一個轉型社會的語境中有著不同於西方語境下的意義。

關鍵詞：專業主義，中國新聞業，媒體改革，中國社會，話語，權力

---

童靜蓉是威斯敏斯特大學 (Westminster University)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她在倫敦大學戈德斯密學院獲得碩士學位。在赴英之前，她在國內從事記者工作多年。她目前的研究興趣主要在於新聞學以及中國政治與社會研究。電子郵箱：J.Tong05@westminster.ac.uk

## **Social Discourse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ONG Jingrong

---

###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norms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n China, and its specific meanings, through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approach.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s a normative value system as well as the occup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ed for journalists in social discourse. It is argued that there are three social discourses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n China: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official discourse, and citizen discourse. Overlaps can be identified among the three discourses. Chinese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s changing over time in the discursive field where power struggles take place. The media negotiates with contextual powers in expressing and practicing its professionalism. It is also argued that Chinese professionalism norms are endowed with context-specific meanings and understood in a wa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western discourse. The same expressions for professional norms, such as “tak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autonomy,” and “objectivity,” carry different implications in the contexts of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Keywords:** Professionalism, Chinese Journalism, Discourse, Media Reform, Chinese Society

## 導言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中國社會和中國媒體經歷了深刻的改革，媒體環境以及媒體與權力的關係發生了重大而微妙的變化。在轉型過程中，專業主義變成了中國新聞業話語中的一個突出議題。很多海內外的媒體研究者對這個領域投入了關注。他們開始質疑新聞專業主義（特別是西方意義上的專業主義）是否在中國新聞業中出現了。但是大多數文獻（如Pan & Chan, 2003）聚焦在探討記者們有什麼樣的職業宣稱上，其重點不在研究社會和媒體機構為記者建構的專業主義上。然而，本文認為新聞專業主義不僅是記者的宣稱，而且是話語的建構。

話語是一系列的社會實踐，它為權力和意識形態所建構（Fairclough, 1989）。新聞專業主義話語既是記者的意識形態，亦是當權者、機構和社會為記者構建的意識形態。新聞專業主義的社會話語反映出不同社會實體（social entities）為維護自身權力和宣揚其意識形態而對記者角色作出的定義和期待，其目的在於使這些定義與話語變成被記者和社會中的普通人所接受的常識。此外，作為一種話語價值體系和意識形態（Aldridge & Evetts, 2003），新聞專業主義的概念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中是有變化的。比如在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脈絡中，在話語構建過程中，新聞專業主義被賦予了不同於西方話語的含義。理解這些話語體系以及其特殊的涵義對理解中國新聞業存在的顯見而微妙的矛盾和權力衝突有所幫助。那麼，如何考量後改革時代的中國新聞專業主義話語及其意義？這是本文想討論的問題。

本文打算從新聞專業主義話語的社會性建構的取徑（approach）入手，分析三套話語體系：<sup>2</sup> 機構（職業）話語、官方話語、和民間（公眾）話語，然後在中國社會脈絡中剖析其含義。後改革時代，中國社會中各種權力的博弈和意識形態的較量構建出幾種不同的新聞專業主義話語，這些話語幫助建構記者的身分認同（identity）（Elsaka, 2004），也幫助相關機構管理記者並且樹立其自身的形象；其中既體現了當權者對新聞業的要求，也反映了中國民間對新聞的認同。首先，新聞業建構出媒體機構話語。改革後，中國新聞業在黨和市場兩股力量的拉鋸中尋求自身的發展。作為一個在專業化過程中的職業（Splichal & Sparks, 1994），中國新聞業既

需要贏得當局的支持，又需要獲得市場的青睞。因此建構並推崇一種既取悅於當局，又投市場所好的專業主義話語成為一種必要的策略。其次，當局亦建構並推廣官方新聞專業主義話語來維護其統治。改革後的當局既希望不用掏錢養活媒體，又希望傳媒繼續充當當局忠實的傳話筒。在這種矛盾下，建構話語並依賴話語實踐是一種必然的結果和策略。最後，中國民間本身也有對新聞業的解讀。由於中國特殊的社會環境，社會民間對新聞業存在著特有的需求，這種需求反映在對新聞業的解讀和期待上，並形成一股力量左右其他兩種話語。這三種話語體系在特徵和結構層次 (typology) 上存在著重疊，並隨著權力關係的博弈和消長發生改變。此外，在建構話語的過程中，社會實體賦予了話語以特殊涵義，這體現在記者對話語涵義的理解上。

本文中引用的實證材料來自對20名記者所作的深度訪談，以及2006年所作的為期一個半月的參與觀察。這20名記者來自中國南部一家具有全國性影響的大報，以及東部一家報業集團中的黨報及其子報。訪談問題主要考量了記者知覺，包括記者對職業理想的宣稱和解讀、對新聞業以及日常工作的理解、對媒體機構的理解，以及對社會現實的理解。訪談在面對面的情況下開展，每次訪談時間在一個小時至兩小時之間。此外，本文亦對一系列文本資料進行了解讀和分析，包括報章、媒體機構出版物、專業期刊、官方講話和文件、記者自述性文字以及記者的博客文章。

## 新聞專業主義

在討論中國新聞專業主義話語之前，有必要先將新聞專業主義理論框架勾勒出一個輪廓，作為本文的理論基礎。專業和專業主義的概念源自社會學。一方面，如果一個職業被認為是專業，這個職業必須具備相應的特點能夠將這個專業從社會上的其他專業和門外漢中區分出來 (Barber, 1963; Carr-Saunders & Wilson, 1933; Flexner, 1915; Goode, 1969; Lewis & Maude, 1952; Merrill, 1986)。因此，專業主義被看成是一種與職業活動以及社會組織有關的專業特徵的積累。此外，專業主義隨著

時間遷移以及專業在專業化過程中的地位變更而改變。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一個專業在社會中具有權力，而專業特點被認為是維護這種權力的保證 (Freidson, 1994; Johnson, 1972)。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專業主義是專業的一種策略。此外，學者們認為在社會脈絡中專業和其他社會機構的關係對專業發展也非常重要 (Freidson, 1994; Klegon, 1978)。其他社會實體的喜惡，特別是當權者的態度，會加速或者阻礙一個專業在專業化過程中的上移 (Johnson, 1972)。簡言之，專業主義是專業話語的價值體系，是一種專業意識形態 (Evetts, 2003)。它在專業從業者的職業行為中起到指導作用，並且作為一種專業策略而成為一種權力的來源。

專業主義研究也應用在新聞學研究裏，不過在西方新聞業中，新聞專業主義的含義從未形成一個統一的概念 (Beam, 1990)。總體上講，專業主義被認為是保持客觀性和追求真理的職業理念 (Schudson, 1978)。自由度也被看成是專業主義的核心價值 (McLeod & Hawley, 1964)。其他學者們 (Gans, 1980; Schudson, 1978) 則認為專業主義的概念還應該包括社會責任性。

無論其概念是什麼，新聞專業主義總是被認為是媒體從業人員的自我意識和影響媒體機構操作的一種方式 (Christian, 1980)。對於專業主義的訴求則被看成是記者的自我認同和為記者建構的身分認同 (Elsaka, 2004)。此外，專業主義既是記者的宣稱和訴求，也是一種策略性的話語，比如說作為一種職業控制的話語 (Evetts, 2003)。在這一點上，一些學者認為專業主義是一種機構策略 (Birkhead, 1982; Carey, 1969; Tuchman, 1972, 1978)，而另一些學者認為，當面臨著職業控制的時候，像其他試圖在專業化過程中提高其專業地位並獲得特權的職業一樣，新聞業也使用專業主義話語來宣稱他們的專業地位 (Schudson, 1978, 2001)。由此可見，專業主義不僅指的是記者的宣稱，而且還是被媒體機構、社會實體、新聞業，以及職業所推崇的專業話語。這是社會脈絡中的各種權力為新聞業所建構的社會話語。當這種社會話語被公眾接受而成為常識後，它就成為民間對專業記者衡量的標準。

## 中國新聞專業主義：歷史的繼承和當今的衍變

從古到今，隨著媒體和當權者的關係變更以及社會情境的漸變，中國新聞專業主義社會話語幾經變化。二十世紀前50年，中國早期新聞業見證了新聞專業主義的雙重話語。第一重早期話語近似西方話語(陸曄和潘忠黨，2002)。一些著名的報人，比如王韜、梁啟超、黃遠生、張季鸞、邵飄萍，為報業推崇自由主義。他們認為報紙應當有言論自由，應當監督政府和服務公眾。一個傳統的例子是《大公報》，其辦報宗旨是：「不黨，不私，不賣，不盲」(丁淦林等，1997)。詳細地解釋其辦報宗旨，就是大公報不能夠有黨派傾向性，它必須沒有私心地服務公眾，不能夠因為利益交換稿件。此外，它應當堅持真理和事實，而不是屈從於主流意見(陸曄和潘忠黨，2002; 鄭連根等，2004)。簡而言之，大公報以及張季鸞(當時的總編輯)認為媒體應當獨立、客觀、中立，認為記者應當追求真理和事實。第二重早期話語事實上是黨報新聞業的意識形態。鄭貫公、陳獨秀和孫中山等報人認為報紙應當迎合黨的需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很多各種黨派的機關報，比如共產黨的《嚮導周刊》和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就為共產黨和國民黨等黨派的需要而創辦(丁淦林等，1997)。中國新聞業歷史上的自由主義新聞業和黨派新聞業這兩重話語在當今新聞業的專業話語中依然有迹可循。

1949年後，黨的新聞業控制了中國新聞傳媒。記者被賦予的身分是黨的喉舌，因此也就有了相應的權力(de Burgh, 2003)，他們應當是黨的意識形態和政策的宣傳員，應當忠於黨性(Zhao, 2000)。1980年以後的經濟改革促使了中國新聞業的變革，其中最顯著的變化是市場的介入和國家財政控制的日漸減弱。中國媒體經歷了深刻的變化：報業集團、廣電集團的建立；內容更加開放的新報紙和新欄目的創辦；國家決定停止對大部分媒體的經濟補貼；以及調查新聞的出現(Wu, 2000; 俞虹，2003)。除了媒體環境的改變以外，經濟改革給媒體和當權者關係也帶來了微妙而複雜的變化。中國新聞業的新迹象，特別是權力從媒體場域某種程度上的撤離，暗示著中國社會中新聞專業主義的社會話語在改變。市場力量的介入在媒體機構裏激發出漸多的調配空間(Pan, 2000)，這使

得媒體機構以及作為職業的新聞業可能尋找一種有利於在專業化過程中進行職業發展的話語。

## 媒體機構話語

然而在構建新聞專業主義這點上，媒體機構和新聞業也有著他們的利益和私心。在中國，新聞業曾是個非常特殊而有特權的行業。1978年改革以前，記者更加像是半個政府機構工作人員，黨用一種政治控制的方式將他們納入黨的體系，成為黨工作的一部分 (Wu, 2000)。國家補貼媒體，黨的媒體獨佔讀者市場 (Zhao, 1998)。在一個城市裏通常是一報一台 (丁淦林等，1997)。記者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以黨的喉舌的形象出現 (de Burgh, 2003)。當然，他們享有的特權並不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特權，而是被黨報體系所賦予的一種政治特權。

八十年代的改革在給中國新聞界帶來了一定的自主空間的同時，卻也帶來了特權的喪失 (Pan, 2000)。因此對專業主義的訴求從某種意義上變成了一種追回特權的策略性行為。一方面，新聞業有對專業主義訴求的本能，這種訴求給予他們一種在為公眾服務的感覺，並在公眾面前樹立相應的形象。相對於改革前，政治控制的漸趨寬鬆為中國新聞業在黨的控制下進行專業化的活動提供空間 (Zhao, 1998)。另一方面，新聞也需要通過專業宣稱來重新獲得公眾的認可和在市場化過程中喪失的特權。例如，調查新聞的出現贏得了「輿論監督」的名聲 (de Burgh, 2003; Zhao, 2000)。因此，專業宣稱服務於新聞業和媒體機構的需要。即媒體機構需要通過某種專業宣稱來建立專業的形象以求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勝。

建立形象的一個有效策略就是通過辦報宗旨或媒體報道來推崇某種機構意識形態。媒體辦報宗旨可以被看成是報紙為記者建構專業理想，為報紙本身和記者建構身分認同。報紙希望其員工遵循這種機構意識形態來開展工作，更希望公眾接受通過機構話語構建的報紙形象，從而開拓並維護市場。這一觀點在對一些記者的採訪中得到了驗證。比如，有十二年新聞從業經驗的楊行<sup>3</sup> 在談到他對新聞業和專業理想的理解的時候說：

「可以說，我以前是沒有理想的，到了這家機構之後，我非常認同它的理念，因此，這些理念也就成了指導我工作的職業理念。」  
(楊衍，訪問進行於2006)

盧方，是一名有六年報紙工作經驗的深度報道記者，她認為：

「別人眼裏會覺得它是一個比較銳進的媒體，其實我們的報紙並不是這樣，只是它的市場需求決定了它必須這麼做，因為在一開始打市場的時候，它在讀者心中就培養了這樣一種閱讀期待。大家期待的是這份報紙給他們一種不同凡響的新聞。所以它如果想繼續保持這個市場，得繼續做這方面的新聞……報紙有理想是一回事，但是從企業操作的層面上來講，這只是它的一種策略。一種企業策略。它只有打這樣的路線，才能保住這份市場。」(盧方，訪問進行於2006)

而不同的報紙有著不同的辦報宗旨，意味著有不同的策略。在媒體改革後，中國報業的中心是黨報，邊緣是各類非黨報報紙，比如晚報、都市報和小報 (Wu, 2000)。Huang (2001) 認為，自從九十年代後，中國的主流日報包括黨報、黨領導的晚報，以及城市報，這些分類是根據他們不同的內容以及編輯方針而定的。然而Huang卻忽略了中國報業出現的其他變化。除了以上所述的三類報紙以外，第四類報紙，即調查性報紙，在中國報業市場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這類日報，比如1998年創辦的《南方都市報》以及2003年創辦的《新京報》，均以調查新聞以及獨立報道聞名。因此，本文認為中國報業主流大致有以下四個層次：黨報、晚報、市民小報，以及推崇調查新聞並因此聞名的報紙。為了分析各類報紙通過辦報宗旨而建構的專業話語，本文選擇四份有影響力的報紙來分析，他們分別代表主流報紙的四大類。

第一份報紙是《南方都市報》。它是中國發行量很大的一份報紙。近幾年這份報紙因為調查報道一些社會題材以及揭露官員的腐敗壞事而聞名。<sup>4</sup> 它可以被看成是獨立報道的前鋒和調查性報紙的典範。其辦報宗旨是「辦中國最好的報紙」<sup>5</sup>，辦報原則是「及時生動地還原新聞，客觀準確地再現事件，具體周到地服務生活」(南方都市報，2004)。由此可見，《南方都市報》將最好的報紙定義為一種客觀、中立、獨立和必須服務公



眾的報紙，並且要求其記者必須追求真理和新聞事實，並擔負起社會責任。<sup>6</sup>這可以被理解為《南方都市報》所宣稱的，並向記者推崇的專業主義。

第二份報紙是上海的《新民晚報》。它創辦於1929年，是中國最早的晚報，也是典型的黨領導的晚報(Huang, 2001)。其刊登的內容要比黨報來得軟，卻比市民小報來得硬。這份報紙目標在於「飛入尋常百姓家」，它認為其記者應當「宣傳政策，傳播知識，移風易俗，豐富生活」。這樣的宣稱反映出新民晚報認為其記者應當作為宣傳員和教育者，服務黨，服務人民，而且還應當肩負起社會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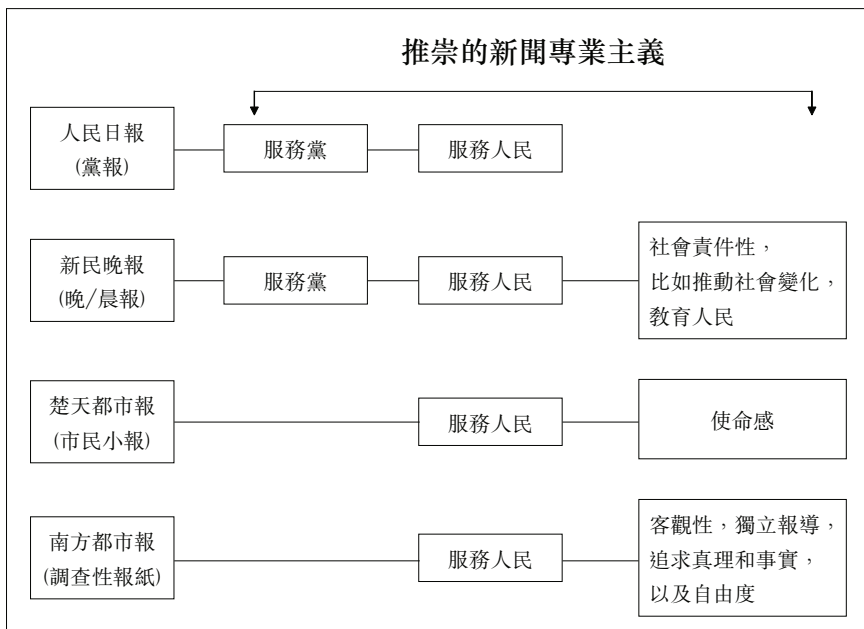
第三份報紙是武漢的《楚天都市報》，它代表著市民小報。這份報紙在湖北省非常有影響力。它宣稱要「全心全意為市民服務」，並在辦報宗旨上詳細地解釋了這項宣稱：「想市民之所想，急市民之所急，幫市民之所需，解市民之所難」。這些宣稱反映出《楚天都市報》對記者的要求。它不僅希望其記者服務人民而且還賦予了記者一種為人民說話以及幫助人民的使命。但是「服務人民」這一宣稱和西方話語中的服務公眾有所不同。從其辦報宗旨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宣稱指的是幫助人民解決問題，而不是作為「第四種權力」來服務公眾利益，並與國家和各種利益集團相抗衡。

第四個例子是《人民日報》。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其目標是「及時準確地報道新聞事件，準時準確地宣傳和反映黨和政府的政策，反映人們的觀點看法」。對其宣稱的解讀可以是服務黨和政府，在黨和人民之間起到中介作用。

圖表一顯示主流報紙中四種主要類型的報紙專業意識形態。我們可以看到所有這四類報紙公認的專業主義的價值是「服務人民」。這不僅反映市場的影響力而且也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中國新聞專業主義的「類西方話語」可以在調查性報紙中找到。對比嚴肅一些的晚報和軟化一些的市民小報，我們可以看到前者推崇「服務黨」和「服務人民」，而後者只是推崇「服務人民」。

如上所述，媒體機構構建新聞專業主義不僅是為了給他們員工工作上的指導，也是為了樹立他們在公眾面前的形象。換句話說，媒體希望公眾知道一個專業媒體應該具有的特點。使用標語和辦報宗旨來告訴公

圖表一 四類主要類型的報紙的專業意識形態



眾是一種方式，而通過媒體話語來推崇則是另外一種方式。所以在利用標語和編輯方針推崇專業主義之外，媒體還通過刊登報道來推崇職業意識形態，為他們的目標公眾提供一種對新聞專業的理解。在一些特別的時刻或者特殊事件發生的時候，媒體機構直接地在媒體話語上推崇職業意識形態。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00年和2003年的記者節<sup>7</sup> 報道。關於記者節報道，本文選擇《南方周末》<sup>8</sup> 和新華社<sup>9</sup> 的兩個例子作為自由報業和傳統媒體的代表進行解釋。2000年第一個記者節，《南方周末》發表了一系列特別報道來紀念對中國記者意義特別的一天。這份報紙刊登了如下的話語：

「當我們把真相告訴公眾，我們不僅表達了記者的憤怒，我們更表達了社會的良知……我們……給弱者以關懷，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sup>10</sup>

分析其文本，我們可以看出《南方周末》鼓勵記者追求真理，代表社

會良知，並且承擔起社會責任，以圖阻止權力的濫用，代表公眾利益和推動中國社會前進和保持其穩定。《南方周末》在字裏行間推崇的專業主義具有和西方話語中最接近的意義。

而從新華社對2000年和2003年的記者節的報道，我們可以看到媒體機構推崇的新聞專業主義的另一面。由於新華社在中國新聞業的官方地位，其意識形態可以被認為是黨的新聞事業的意識形態。它宣稱記者應當服務黨。但是在此同時，黨派新聞專業主義也包含承擔社會功能的意味。在2000年，新華社稿件刊登：

「(記者應當)深入持久地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充分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意見、願望和呼聲，為全黨全國工作大局服務，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服務。」<sup>1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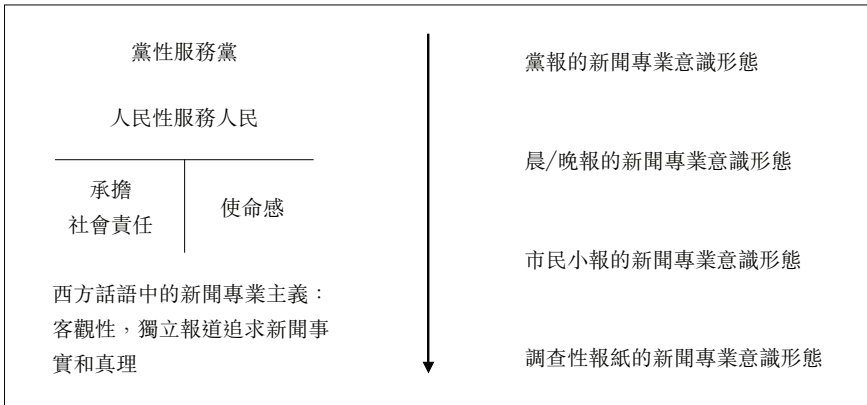
而在2003年，除了繼續強調「記者應當成為黨和政府的喉舌」，新華社報道還宣稱「記者必須代表社會良知」，<sup>12</sup> 這項宣稱同《南方周末》的標語吻合。新華社在宣稱上的輕微變化事實上反映出新聞專業主義社會話語的變化。

既然話語是意識形態的工具，它必然反映出權力的消長。對於《人民日報》或者《新華社》這類媒體機構，他們和權力有著最緊密的關係，他們推崇的專業主義和權力機構在官方話語裏推崇的黨性極為類似。而那些在權力邊緣的報紙，他們的專業主義則同正統的官方意識形態有差距。因此中國新聞專業主義的媒體話語並不是單一的，而是分層次的。其層次隨著媒體和權力之間距離的不同而變化。圖表二可以看出這個層次特徵。

## 官方與公眾話語

除了媒體機構推廣的機構話語之外，對新聞專業主義，中國社會中還有官方話語和公眾話語。堅持「黨性」是中國新聞專業主義官方話語的核心價值。自從共產黨首次在1942年《解放日報》的改革中闡述「黨性」<sup>13</sup> 以來，「黨性」一直是辦報的最高指導方針，儘管中國新聞業目睹了幾次在「黨性」和「人民性」之間的爭辯以及引起的政治和社會震蕩。「人民性」認

圖表二 中國報業新聞專業主義機構話語 (新聞專業意識形態) 的層次特徵



為報紙應當報道人民的生活和觀點。1956年《人民日報》的改革被認為是黨報從「黨性」轉向「黨性」和「人民性」兩者結合的一個里程碑。然而，在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運動停止了這場新潮流，反而認為「人民性」是資本主義的概念。直到1979年，「人民性」才重新被提出。在那以後，卻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人民性被放到了黨性之上。鄧小平和胡喬木分別在1983年和1982年批評了這場自由主義浪潮。<sup>14</sup> 然而在1989年的事件中，「人民性」再次被放到「黨性」之上。只是事件最終導致了推崇「人民性」和媒體自由的有關領導人的下台。在平息動亂後，江澤民和李瑞懷都強調黨報必須遵從「黨性」，而且「人民性」是同「黨性」相符合的，這意味著，「服務黨」就是「服務人民」。<sup>15</sup>

儘管「服務黨」依舊是處於統治地位的官方話語，但是經濟改革後，對新聞專業主義的官方話語也有了一些改變。1998年朱熔基到訪焦點訪談的評語反映出在官方話語上的改變。朱作了如下評語：「(中國傳媒應當有以下功能)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sup>16</sup>，儘管他也強調正面報道很重要。朱熔基的傾向事實上反映出當局官方話語的改變。此外，江的繼承人，胡錦濤在2003年要求中國媒體要「貼近實際，貼近群眾，貼近生活」<sup>17</sup>。這個原則被認為是共產黨對宣傳工作的新指導方針，也被認為是一種報業的解放。<sup>18</sup> 這「三貼近」原則被當時的主管宣傳意識形態的李長春在共產黨機關刊物《求是》上發表的文章<sup>19</sup> 中進一步地

解釋。李解釋道，貼近實際就是要「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現實……更好地為黨和政府的工作服務」，貼近生活和貼近群眾是「立足生活……使宣傳工作更加合情合理……立足群眾，想人們所想，言人們所言，做人們所做……」（李長春，2003）。由此可見，貼近群眾的人民性在官方話語中也得到了提倡。

從以上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官方話語，通常在官方下達的文件以及官員講話中顯現。除此之外，當局在處理對某些特別重大事件報道的態度中也體現出官方話語。在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非典）的報道中，胡錦濤、溫家寶指示中國媒體必須如實報道非典情況。這場非典的報道戰似乎表露了中國媒體的一些新迹象。<sup>20</sup> 觀察家們甚至驚呼中國媒體出現了新局面。<sup>21</sup> 而且，在同一年《南方都市報》刊登的對孫志剛案件的報道<sup>22</sup> 也暗示著中國媒體的巨大進步，有人甚至開始歡呼媒體自由的到來。<sup>23</sup> 然而這些樂觀的迹象並不能反映新聞專業主義官方話語的全貌。2004年《南方都市報》兩名主編被監禁，2005年《新京報》總編輯被撤職，《南方都市報》副總編輯被撤職，以及2006年《中國青年報》《冰點》專刊被勒令停刊，這些事件大大挫低因為非典報道、孫志剛案報道以及共產黨的一些新政策而帶來的喜悅。<sup>24</sup> 這些迹象顯示並反映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官方話語在黨性和人民性之間搖擺。

至於民間話語，除了記者們在出版物上的自述以及公眾的私人經歷外，有影響力的報道間接地引導了公眾對新聞專業主義的知覺。公眾通常通過報道來理解記者。有影響的報道，比如2000年的杜樹貴案、2003年的孫志剛案，以及2005年的阿星殺人案，極大程度上影響了公眾對新聞專業主義的理解。因此，對社會有很大影響的報道間接地向公眾和記者推崇了新聞專業主義，並且通過這些報道賦予其特殊的含義。而有重大影響的報道往往都是鋤奸懲惡，揭發黑幕的報道。因此民間話語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並不同於官方話語。一項對北京、上海和廣州<sup>25</sup> 三個城市的公眾對記者態度的調查顯示，80%的公眾認為記者最重要的功能是「為公眾傳遞信息」，59.5%的市民認為是「監督社會」，44.4%的市民認為是「為弱勢群體說話」，而且只有23.0%的公眾認為應當是「黨和政府的喉舌」。此外，公眾還認為記者應當是正義的象徵，有64.1%的市民在遇到不平之事時會尋求媒體的幫助。<sup>26</sup>

表格一 中央電視台2003八大風雲記者(根據《講述·首屆中國記者風雲榜》整理)

記者名字	服務機構	著名報導	報導類型
王克勤	中國經濟時報	北京出租車壟斷黑幕	調查深度報導
陳峰	南方都市報	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	調查深度報導
冀惠彥	中央電視台	伊拉克戰爭系列報導	戰爭報導
江雪	華商報	夫妻看黃碟事件追蹤報導	調查深度報導
朱玉	新華社	龍膽泄肝丸：治療良藥還是致病根源	調查深度報導
曲長纓	中央電視台	臨汾礦難瞞報真相	調查深度報導
趙世龍	羊城晚報	長州戒毒所強賣戒毒女為娼	調查深度報導
柴靜	中央電視台	北京非典狙擊戰	深度報導

2003年中央電視台(央視)評選的八大風雲記者可以說明新聞專業主義的民間話語。它不僅反映了媒體機構推崇的意識形態，也反映了公眾理解的專業話語。獲獎的記者由媒體機構提名，通過網絡由公眾投票。另外，在競選過程中，專家和學者的意見也會被考慮到。這些典範不僅反映了媒體機構眼裏的好記者，而且也是公眾眼裏的好記者。因此他們反映出新聞專業主義的公眾知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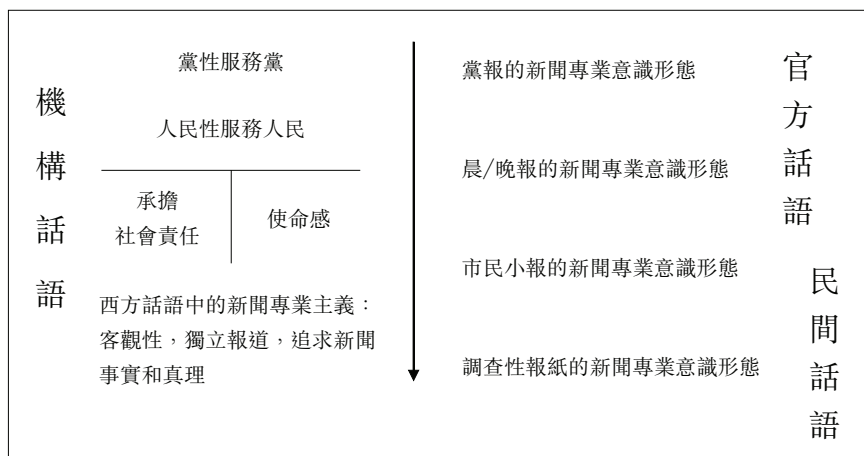
表一列舉了記者的名字、媒體機構，和其著名的報道。從這些典範中，我們將民間話語用以下幾個詞來概括：尋求真理和事實，為弱者出頭，不怕艱難危險，為公眾利益說話，推動社會發展或者促進社會改革。

## 權力博弈和話語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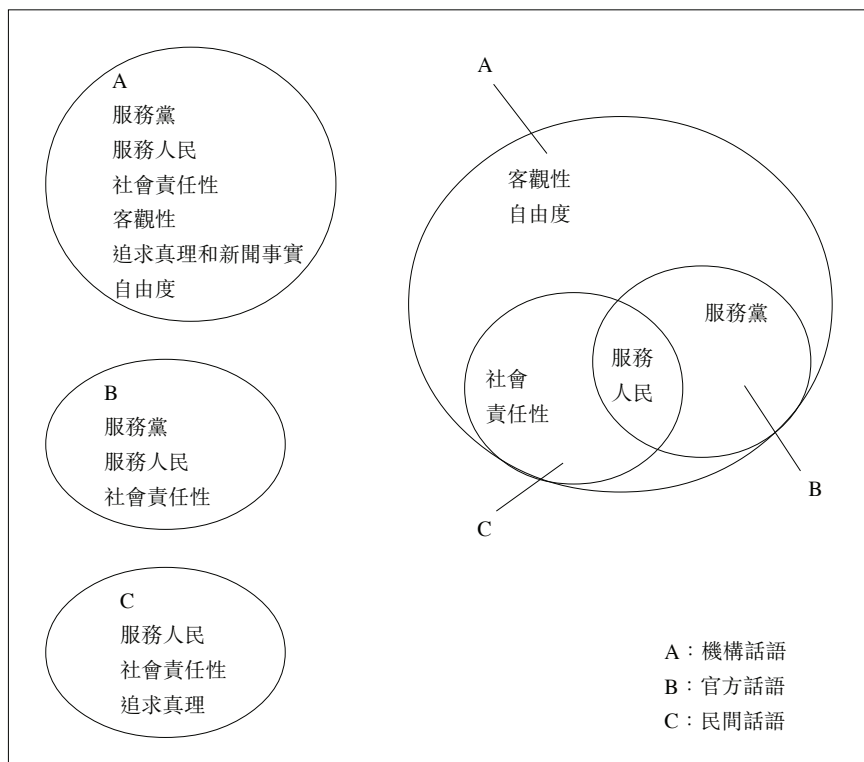
以上的分析為中國新聞專業主義的社會話語勾勒了一幅圖畫。圖三是中國新聞專業主義社會話語的特徵和結構層次。機構和職業話語包括了民間話語和官方話語，而官方話語和民間話語在某些方面重疊。民間話語更接近於非黨報機構所推崇的話語。圖四顯示了三種話語的重疊。

由此可見，中國新聞專業主義的社會話語在中國語境中並不是固定的，而是有多種層次，隨著時間而改變，並且隨著各種權力較量的趨勢而改變，它也反映出在社會脈絡中的各種權力的消長。

圖表三 中國新聞專業主義社會話語特徵和結構層次



圖表四 三套話語的重疊



在中國，20多年的經濟改革導致了意識形態價值體系的重組，這種意識形態已經不同於共產主義社會遺留下來但已「減弱的意識形態」(He, 2000)。改革以來，中國意識形態已經從理想的毛澤東主義轉變到鄧小平的實用主義(Lu, 1999; Pye, 1988)。鄧的實用主義已經促使融合了西方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以及中國改良馬克思主義(新左派)的混合意識形態在社會思潮中(特別是在知識分子中)出現(李金銓, 2004; 蕭功秦, 2002)。再加上中國的傳統儒家思想以及削弱了的共產主義思想，中國意識形態中出現了各種「不和諧音」，它投射在中國媒體上就形成了多種話語(He, 2000)。因此，將中國新聞記者想成不會考慮新聞自由、沒有自身思想的黨的傳話筒在當今中國顯得太幼稚了。此外，由於改革開放和加入世貿組織，中國記者有更多的機會瞭解他們的西方同事們是怎麼想的並且是怎麼做的，同時也受到西方新聞道德規範的影響。社會話語的愈加開放和多元化促使媒體從業人員開始宣稱和實踐他們的專業理想。媒體機構以及當局者顯然無法忽略這種專業訴求。

與此同時，新聞業受到了發自人民的從下而上和發自黨的從上而下的要求。正如上文所討論，改革導致中國社會裏出現多樣的意識形態價值觀。相對於傳統的集體主義，中國民眾的個人主義和自我身分認同被改革浪潮所喚醒(Weber, 2002)。「我」的意識開始渴望吸引媒體的注意力。此外，中國經濟改革不僅帶來快速的經濟發展，而且也導致昂貴的社會代價：社會不平等的加劇，貪污腐敗，貪贓枉法，以及社會的不穩定(Gallagher, 2002; Lewis & Xue, 2003)。人們渴望看到平等，以及對貪污腐敗和貪贓枉法者的懲罰。然而，中國政治體制和法律體制的現狀導致了有一些無權無勢的人們並不能夠從社會中得到他們所需要的平等。因此，人們需要有人站出來充當政府和人民之間的紐帶，並且承載人民意願的表述。而在黨這方面，共產黨儘管依舊希望中國媒體成為他們的馴服工具，但是卻又將其推入市場，讓其自給自足——允許媒體報道接近人民大眾生活的題材顯然可以幫助他們達到這一目的。此外，允許出現新的新聞專業主義話語和給新聞業一些自由度也是中國共產黨從上而下的要求。正如趙月枝(Zhao, 1998, 2000)指出，中國共產黨同樣對調查報道有需求，因為共產黨希望懲戒那些貪贓枉法者以儆效尤，並且顯示黨的純潔性。



這些要求的結果就是「監督」節目/欄目和其他接近於百姓生活內容的報道出現，這些報道體現了「人民性」以及類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內涵。例如，代表公眾新聞的「焦點訪談」和代表民間新聞的「南京零距離」，作為黨的媒體體系和產業化之間的妥協而出現(史安斌，2005)。可以說，這些需求事實上促使了「人民性」和類西方話語在中國新聞專業主義社會話語中的出現。

改革後，在政府的宣傳管制、市場利潤、大眾需求以及自身專業訴求這些權力光影交錯的互相作用中，媒體意識到需要在中間取得平衡。在市場壓力下，媒體必須迎合廣告商以及大眾的需求。為了得到人們的認可，他們則要盡力地試圖迎合人們的口味來構建一個能被公眾更快接受的形象。此外，作為黨的喉舌而來的新聞業特權在經濟社會轉型後被逐漸削弱，因此作為一個在專業化過程中的職業，新聞業需要重新獲取他們的特權。推崇一定的專業主義，比如「追求真理」、「幫助公眾」，以及「反映社會黑暗面」這些受到公眾歡迎的話語，實際上被媒體機構用作一種佔有市場的策略，也被新聞業用來贏回在商業化過程中喪失的特權，並且在專業化過程中獲得專業整體地位上升的一種策略。但與此同時，作為一個在專業化過程中希望自我提高的專業，當權者贊許的態度極為重要。否則，職業發展就會受到阻礙。因此，考慮到黨和市場的需要，媒體機構專業主義話語兼顧了民間話語與官方話語，但是根據不同媒體的市場定位，出現不同的傾向性。這是在專業和各種權力之間的一種妥協。

此外，傳媒機構根據媒體環境，比如市場競爭、目標閱聽人、公眾知覺、社會心理以及官方對媒體的態度，來調整其專業主義話語，以及其對專業主義的推崇程度。除了上述的媒體和權力之間的距離的差異導致了媒體機構專業主義話語的分層，另外在媒體環境中的變化，比如官方態度的改變，也影響到媒體推崇的話語的改變。媒體隨著環境的改變，比如媒體與權力之間關係的改變，而調整其專業主義。《新京報》<sup>27</sup>是個很典型的例子。2003年11月創刊的時候，《新京報》在版面上刊登了她的口號「負責報道一切」，之後這個標語在版面上一一直刊登著。《新京報》也詳細地解釋了這個口號：

「這是中國賦予我們這張報紙的特色；有責任報道一切新聞，追求新聞的終極價值和普世價值；更要對報道的一切新聞負責，包括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負責報道一切」。<sup>28</sup>

然而兩年以後，在2005年11月3日，這條標語突然從版面上消失了。一個多月以後，其總編輯<sup>29</sup>被撤職（《聯合早報》，2005）。<sup>30</sup>《新京報》事件的主要原因被認為是《新京報》惹惱了當權者，自然其背後還有利益的因素。<sup>31</sup>因此，口號的消失事實上是這家媒體與權力關係改變的一個明顯跡象。這一事件也表明了中國當前媒體環境的改變：後非典時期中國新聞管制的收緊。<sup>32</sup>儘管不能決斷地預測，在這事件發生之後《新京報》就不再推崇其一貫以來的專業主義，但至少它已經不再明顯地宣揚了。政治風險與專業訴求之間的輕重以及政治支持與專業訴求實現之間的關係一目了然。

與媒體機構類似，當局者亦根據黨的需要而調整其話語。上文闡述了黨和政府對「人民性」的新聞以及監督報道亦有需求，兼顧民間對新聞的訴求，這有利於他們減輕負擔並樹立黨的合法性。但是這些允許都是在黨的管制範圍內的。快要超出黨所允許的底線，或者黨的需求有所改變，官方話語就會發生變化。在我的調查中，大部分接受採訪的記者表示2003年是中國近年來新聞管制最鬆的一年，之後就漸漸收攏。<sup>33</sup>如江偉所述：

「2003年是頂峰，從那以後，我們感覺到新聞管制越來越緊，很多稿子以前可以發的，現在都發不出來了。」（江偉，訪問進行於2006）

除了上述《冰點》案等反映出官方話語收緊的跡象之外，官方新聞專業主義話語的微妙改變還可以從有關部門下達的禁令以及媒體機構的自身審查 (self-censorship) 上看出來。在一家報社的新聞室，經常可以看到宣傳部下達的一些禁令。比如，對於嚴重的交通事故、後果嚴重的犯罪行為和群體性事件等，有些不允許報道，而有些則只允許採納新華社的通稿。<sup>34</sup>江偉這麼解釋這一轉變：

「2003年，那時候胡溫政權需要通過建構一種自由，民主的形象來穩固其政權和建立其合法性。當然，這亦有其他的一些大環境上的因

素。只是這是一個時機，而我們的黨運用了這個時機，媒體則享受了這個時機。可是，從那以後，黨的管制越來越緊。後來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可以證明這一點。」（江偉，訪問進行於2006）

改革後中國新聞業成了一個權力博弈場，話語變化則是這種權力博弈消長的體現。媒體以及新聞業在不斷地試探甚至於推進權力的底線，一旦發現自身觸到雷區，即往回退避。而當局在容忍之餘亦予以反推。民間的力量在中間起到推動的作用。新聞專業主義話語因此在幾個層面之間搖擺。而在幾次權力「推攘」之後，底線畢竟得到了推進，話語亦得到更新。

## 中國語境下的特殊含義

學者們認為社會文化脈絡的大環境對新聞專業主義以及其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Birkhead, 1982; Boyd-Barrett, 1980; Christian, 1980)。不同的媒體環境導致具有不同含義的專業主義，它受到社會脈絡中各種力量不同程度的影響。專業主義話語中類西方話語的表述，比如服務公眾、承擔社會責任、自由度以及客觀性，在中國脈絡下是否具有類似於西方語境下的含義，這需要被考察。

Siebert和他的同事們創立的報刊四種理論對今天的全世界範圍內的新聞業依然有啟示 (Siebert et al., 1963)。如果我們認為不同的新聞業是在一個連續體中：一端是自由新聞業，另一端是專制新聞業。新聞業的本質根據新聞業/媒體和國家的關係而定。自由新聞業，比如美國新聞業，是獨立的，不受黨派或政權的控制，它作為一種商業機構存在於自由市場中參與競爭，國家對它有最少的控制力，因為國家的控制力受到其他政治經濟集團的干涉。因此，它被認為是「第四權力」，可以在自由民主社會裏起到「看門狗」(watchdog)的作用。儘管是自由新聞業，學者們亦對其利他動機表示了疑問，比如Kaul (1986) 批評專業話語是作為一種新聞業的商業策略所出現的，Solowski (1989) 認為客觀性話語幫助媒體機構維持其在社會系統中的經濟地位，Aldridge and Evetts (2003) 認為專業主義話語作為一套價值和身分系統被媒體機構作為一種自律而推

崇。但儘管如此，自由度、社會責任，以及客觀性是自由新聞業專業意識形態的三類傳統核心話語。那意味著，自由新聞業在媒體行為中有自由度，不受當權者和其他權力實體的干涉，並且可以避免濫用權力 (Boyce, 1978)。在自由新聞業裏專業記者應當在報道和編輯中保持中立和客觀，反映出競爭雙方的觀點，以求為公眾提供事實和真相 (McQuail, 1994)。

對於特權新聞業或者所謂的共產主義新聞業，國家通常對它有獨裁的控制並對它進行補貼。中國新聞也屬於這一類型。可是近年來自由主義的跡象也在中國新聞業上出現，中國媒體慢慢地從完全的國家所有特權媒體體系轉向國家控制外加資本控制的混合型。而且，改變中的政治文化，新社會階層的形成，改革中的中國經濟和社會，以及傳統的文化都對新聞專業主義起到了影響。在這各種因素相互影響的轉型期，中國新聞專業主義自然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文獻認為中國記者對其新聞職業有專業訴求，比如自由度、客觀性和監督社會 (de Burgh, 2003; 陸曄和潘忠黨, 2002; Pan & Chan, 2003; Zhao, 2000)。但是，在新聞專業主義話語建構的過程中，各社會實體根據自我的需要給這些概念賦予了特殊的涵義。

相比其他兩個核心概念，無論在媒體機構的推崇上，還是記者的自述中，自由度此一概念並沒有在新聞專業話語中得到清楚的表述。中國官方從未提過新聞自由的概念，相反，它被「黨的新聞事業」取而代之。而對於媒體機構以及新聞業，這一雷區同樣是需要繞過的。在調查中，當問及職業理想的時候，20名記者中，只有1名提到了渴望新聞自由。其他的用語，比如「追求真理和事實」以及「揭露社會陰暗面」取代了這個比較有爭議的詞語：「自由度」或者「媒體自由」。而且在中國記者的話語中，自由度通常指的是在政策允許的範圍之內「揭露社會黑暗面」以及「監督政府」，並且放在報道刊登之後不會導致社會騷亂和麻煩的前提之下。例如，寧夏，一名社會新聞記者說：

「我們的自由度是走『高壓綫』的。所謂的『高壓綫』是指『政策要允許』，而且『在見報後要避免麻煩』。我們要自由度，不僅僅是因為需要報道的自由，而且還希望能有較大的機會能發表有影響的報道，能使我們出名。」(寧夏，訪問進行於2004)

關於社會責任則有兩種理解方式。其一是社會責任主要的是指反映大多數人的興趣，幫助人們解決他們遇到的不能夠通過平常途徑解決的一些問題，以及因此揭露社會的一些陰暗面。例如，黃海鷹認為：

「我們是少數能夠為弱勢群體出頭的人。即使在市場化時期，中國媒體還是有很強的影響力。當人們遇到不公平對待，或者是遇到通過正當或者法律途徑不能夠解決，或者要花很多精力財力去解決的時候，他們會向我們求助。」(黃海鷹，訪問進行於2004)

此外，尤其在南方的報紙與其記者對社會責任的闡述中，也提到了「推動民主進程」和「形成一種正面的力量推動社會的發展」。<sup>35</sup> 比如，《南方都市報》副總編莊慎之在點評《南方都市報》核心口號時說：「我們希望……成為這個社會進步的一股力量」(範以錦，2005)。黃蕾在描繪他對社會責任感的認知的時候表示：

「我希望我的報道能夠反映出一些新的東西，代表社會進步的東西，能讓這個社會變得越來越好。」(黃蕾，訪問進行於2006)

而客觀性有著最接近西方語境下的意義：平衡報道。但是媒體機構在日常新聞操作中向記者所傳達的涵義以及記者們所領會的意義更多的是指「在報道裏需要有記者的立場」。比如，深度報道記者楊衍在他所供職的報紙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業主委員會的報道後，在他的博客上寫了一篇名為《無法解決的問題》的自我反省性文章，在其中他闡述了客觀性或者說平衡報道的含義：

「(原稿)<sup>36</sup> 被\*\* (編輯) 退回重寫。重寫，仍不滿意，大概對我沒信心了，他老人家(編輯)說，我來改吧。後來，稿子見報了……(他認為，這篇稿子的) 主要問題是：沒有重點……文章太過平衡，沒有血氣，沒有了棱角。我覺得他說的是有道理的，但馬上有一批『道理』犯上作亂來頂牛：……英國BBC的經典教條——平衡意見。我到\*\* 報社後聽到的最多的理念也是：要給兩方面都說話的權利。……其

實在採訪中，如果涉及兩方面，往往是一方面非常願意說話（十有八九是受欺負的人），對立面卻非常不願意說話（政府或者黑社會）。於是，導致了我們的報道呈現出經常化的站在弱勢一方敘述，而強勢一方只有「不願接受採訪」這樣的表達。但是在\*\*的採訪中，我花了很大精力去採訪了管理公司一方，得到了不少他們的說法。當我把對立面的意見表達到稿子裏時，很可能就出現了稿子沒有立場了，完全成了旁觀者。這樣的結果很可能是，習慣於跟著記者——敘述者思緒走的讀者發現無法表達自己的憤慨：對立雙方誰說的對？那麼，平衡報道的度在哪里？記者的立場如何來表達？記者沒立場行不行？我又想了一下，問題也可能出現在：恰恰是我自己並沒有吃透這些表象背後的意義，所以對事件的把握失去傾向，從而失去立場。我們都知道的一個常識是：沒有人可能做到敘述時沒有個人立場。這樣說可能對讀者是一個侮辱……但說實話，我覺得這樣做還是必要的。」（楊衍，訪問進行於2005）

最後，我將新聞專業主義話語三核心話語在西方自由主義新聞業和中國新聞業中的不同含義在表格二中作一總結。

表格二 新聞專業主義話語三核心話語在西方自由主義新聞業和中國新聞業中的不同含義：

新聞專業主義話語	自由主義新聞業	中國新聞業
自由度	不受各種權力的控制和干涉地報道事實真相	在黨和政府政策的允許範圍內，在揭露社會陰暗面和監督政府的時候，不受到黨國和其他利益集團的干涉和控制
社會責任性	防止權力濫用，促進民主	為普通百姓說話，解決百姓遇到的問題，尤其是不能夠或者比較難通過平常合法途徑解決的問題；促進民主，推動社會發展
客觀性	在報道中採取中立立場，不存在黨派意見和個人態度，客觀地反映新聞事實	有記者立場和態度的平衡報道

## 結語

綜合以上分析，新聞專業主義是一種話語價值體系，同時也是在社會話語中為記者建構的職業身分。本文認為，中國新聞專業主義話語並非單一，而是在宏觀層面存在著三個話語體系：機構（職業）話語，官方話語，以及民間話語。這些話語之間交叉重疊，互相牽制，使得中國新聞專業主義話語場充滿張力。此外，這些話語隨著時間推移以及在話語場境中互相對抗的各種權力的消長而改變，使得話語體系內部出現分層。

再者，新聞專業主義作為一種價值體系，媒體以及新聞業在表達和實踐的時候與社會脈絡中的各種權力進行了協商。對於權力、機構以及行業，新聞專業主義並非絕對的利他性，而是一種控制性的策略，其本身是一種權力的來源。當權者推崇滿足自身統治需要的官方專業主義話語，而有私心的媒體機構以及新聞職業同樣將之當一種策略來使用，來管理記者以及在民間樹立自身形象。因此，民間話語變成當權者以及媒體新聞業爭奪和需要顧及的一個場域。此外，在中國語境裏面，新聞專業主義被賦予和理解成一種不同於西方話語的話語。

當然，中國新聞專業主義社會話語中所有的變化和特點都不是突然而來的。相反它們是被中國社會情境中的各種因素歷史性地塑造成的，除了上文所述社會改革過程帶來的思潮衝撞以及權力博弈等因素，還有傳統思想的影響，比如傳統的精英主義和知識分子的歷史功能。在傳統的儒家思想統治的中國，上層和下層之間缺乏交流，而知識分子和官員在他們之間進行溝通，以避免出現社會矛盾 (Pye, 1988)。底層人民的呼聲往往通過知識分子或者所謂的士大夫傳遞給上層，而上層的教條和要求也是通過這批人傳遞給底層。儒家知識分子曾經是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他們參與政治，擁有一定特權，但是不屬於統治階層 (Pye, 1988; 沙蓮香等, 2004)。此外，好的知識分子官員通常被認為是代表著底層人民並且為他們說話。中國歷史上很多有名的例子都證實了這一社會心理，比如海瑞。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有著一種為人民說話和拯救社會的使命感 (沙蓮香等, 2004)。因此，中國語境下的新聞專業主義社會話語是社會脈絡塑造而成且自發而現的。

## 參考文獻

- 丁淦林等 (1997)。《中國新聞事業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中央電視台《講述》欄目組(編) (2004)。《講述·首屆中國記者風雲榜》。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史安斌 (2005年5月25日)。〈當代中國媒體生態的變遷與新聞專業主義的重構〉。  
上網日期：2005年12月14日，取自 [http://journal.whu.edu.cn/research/read\\_research.php?id=283](http://journal.whu.edu.cn/research/read_research.php?id=283)。
- 李長春 (2003年5月)。〈堅持「三貼近」要著重解決五個問題〉。《求是》，第10期。
- 李金銓 (2004)。《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南方都市報 (2004)。《八年》。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
- 沙蓮香、幹春松、彭泗清、廖菲、孫慶忠、郭玉錦等 (2004)。《中國社會心理分析》。北京：遼寧教育出版社。
- 陸曄、潘忠黨 (2002)。〈成名的想像——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新聞學研究》，第71期，頁17-60。
- 俞虹 (2002)。〈當代社會階層變遷與電視傳播價值取向〉。《現代傳播》，第六號，頁1-4。
- 鄭連根、蘇葵 (2004)。〈大公報的「四不方針」〉。《青年記者》，第五期。上網日期：2005年12月1日，取自該期刊網上版：<http://www.dzwww.com/qingnianjizhe/2004diwuqi/200405111378.htm>。
- 範以錦 (2005)。《南方戰略》。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
- 蕭功秦 (2002)。〈新左派與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分化〉。《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第1期(總第76期)。
- Aldridge, M., & Evetts, J. (2003).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ism: The case of journalis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4(4), 547-564.
- Barber, B. (1963). Some problems in the sociology of professions. *Daedalus*, 92, 669-688.
- Beam, R. A. (1990).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as an organizational-level concept. *Journalism Monographs*, 121.
- Birkhead, H. D. (1982). Presenting the press: Journalism and the professional project. 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ty of Iowa, Iowa.
- Boyce, G. (1978). The fourth estate: A reappraisal of a concept. In G. Boyce, J. Curran, and P. Wingate (Eds.), *Newspaper history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pp. 19-40). London: Constable.
- Boyd-Barrett, O. (1980). The politics of socialisation: Recruitment and training for journalism. *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 29, 307-340.
- Carr-Saunders, A. M., & Wilson, P. A. (1933). *The Professions*.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 Carey, J. (1969).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 *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 13, 23–38.
- Christian, H. (1980). The sociology of journalism and the press. *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 29.
- De Burgh, H. (2003). The Chinese journalist: *Mediating information in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 (2003). Great aspirations and conventional repertoires: Chinese regional television journalists and their work. *Journalism Studies*, 4, 225–238.
- Elsaka, N. (2004). *Beyond consensus? New Zealand journalists and the appeal of 'professionalism' as a model for occupational reform*.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New Zealand.
- Evetts, J. (2003). The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professionalism: Occupational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8(2), 395–415.
- Fairclough, 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Longman.
- Flexner, A. (1915). Is social work a profession. *School and Society*, 1, 901–911.
- Freidson, E. (1994). *Professionalism reborn. Theory, prophecy, and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allagher, M. (2002). Reform and openness.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have delayed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54(April 2002), 338–372.
- Gans, H. J. (1980).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London: Constable.
- Goode, W. J. (1969). The theoretical limit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In A. Etzioni (Ed.), *The semi-professions and their organiza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He, Z. (2000). Working with a dying ideology: Dissonance and its reduction in Chinese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1, 599–616.
- Huang, C. (2001). China's state-run tabloids: The rise of "City Newspapers". *Gazette*, 63, 435–450.
- Johnson, T. (1972). *Professions and power*. London: Macmillan.
- Kaul, A. J. (1986). The proletarian journalist: A critique of professionalism.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 47–55.
- Klegon, D. (1978). The sociology of professions: An emerging perspective. *Sociology of Work and Occupations*, 5, 259–283.
- Lewis, R. & Maude, A. (1952). *Professional people*. London: Phoenix House.
- Lewis, J. W., & Xue L. (2003).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success. *The China Quarterly*, 176, 926–942.
- Lu, X. (1999). An ideological/cultur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slogans in Communist China. *Discourse & Society*, 10, 487–508.
- McLeod J., & Hawley S. (1964). Professionalization among newsmen. *Journalism Quarterly*, 41, 529–538.
- McQuail, D. (1994).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 Merrill, J. C. (1986). Professionalization: Danger to press freedom and pluralism.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 56–60.
- Pan, Z.-D. (2000). Spatial configuration in institutional changes: A case of China's journalism reforms. *Journalism*, 1(3), 253–281

- Pan, Z.-D., & Chan, J. M. (2003). Shifting journalistic paradigms: How China's journalists assess "Media Exemplar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0(6), 649–682.
- Pan, Z.-D., Lee, C. C., Chan, J. M., & So, K. (2001). Orchestrating the family-nation chorus: Chinese media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 handover.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4, 331–347.
- Pye, L. W. (1988). *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 Ann Arbo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Schudson, M.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 (2001). The objectivity norm in American journalism. *Journalism*, 2(2), 149–170.
- Siebert, F. S., Peterson, T., & Schramm, W. (1963).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olowski, J. (1989). News reporting and professionalism: Some constraints on the reporting of the new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1, 341–360.
- Splichal, S., & Sparks, C. (1994). *Journalists for the 21st century: Tendencie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among 1st year students in 22 countries*. Norwood, NJ: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Tuchman, G. (1972). 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7, 660–679.
-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Lond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van Dijk, T.A.V. (1998). *Ideology*. London: Sage.
- Weber, I. (2002). Shanghai baby: Negotiating youth self-identity in urban China. *Social Identities*, 8, 347–368.
- Wu, G. (2000). One head, many mouths: Diversifying press structures in reform China. In C.-C. Lee (Ed.), *Money, power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 Zhao, Y. (1998).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and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2000). Watchdogs on party leashes? Contexts and implications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post-Deng China. *Journalism Studies*, 1, 577–597.

## 註釋

1. 非常感謝Colin Sparks教授和Hugo de Burgh教授的教導。特別感謝童昌森先生的建議。我謹在此向《傳播與社會學刊》的評審衷心致謝。他們專業的意見及淵博的知識使我獲益良多。
2. 嚴格地說，存在著四套新聞專業主義話語體系：機構話語、官方話語、民間話語，以及職業話語。在這篇文章中，我並不將職業話語作為單獨一個體系

來分析，其中有兩點原因。首先，這篇文章討論的是宏觀層面上的社會話語，而職業話語更多的是微觀的個人層面。其次，我將職業話語合併在機構話語中附帶解釋。

3. 為了保護接受採訪的記者，本文中出現的記者名字均經過技術處理，並且不提及其在真實媒體機構名稱。
4. Asia Cases 2004 作此評論。2005年11月從以下網址獲得：[http://www.cpj.org/cases04/asia\\_cases04/china.html](http://www.cpj.org/cases04/asia_cases04/china.html)。
5. 雖然《南方都市報》每年都在變更口號，但是「辦中國最好的報紙」這一口號被延續下來，是「南都的核心價值宣言和品牌口號」（範以錦，2005）。
6. 如上。
7. 2000年，11月8號被法定為中國的「記者節」（新華網，2004）。2005年11月從以下網址獲得該資料：[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4-11/08/content\\_2189267.htm](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4-11/08/content_2189267.htm)。
8. 《南方周末》，由南方日報集團創辦於1984年，是一份週報，其以對社會事件和腐敗官員的貪贓枉法進行一系列引起極大社會反響的調查報道而聞名。《南方周末》和其他兩份日報：《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是自由（調查性）報紙的代表。
9. 新華社和《人民日報》以及中央電視台是中國三家最重要的黨媒體，其代表中國的傳統媒體（Pan, Lee, Chan, & So, 2001）。
10. 載自「因為我們是記者」，刊登於2000年11月9日《南方周末》。
11. 載自「牢記神聖的歷史使命」，2000年11月8日新華社發。
12. 載自「我們是記者，我們向前！」，2003年11月9日新華社發。
13. 「黨性」是指黨領導報紙，作為黨的一個部分，報紙必須推廣黨的方針政策（丁淦林等，1997）。
14. 胡績偉，是當時的《人民日報》總編輯，他於1979年闡述人民性高於黨性的觀點。1982年胡喬木駁斥了這種自由化觀點。同樣，鄧小平於1983年12屆三中全會上批評這種觀點。
15. 江澤民於1989年作的「關於黨的新聞事業的幾點問題」講話中闡述這一觀點；在同一時期李的「堅持以正面報道為中心的政策」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16. 源自「朱熔基視察中央電視台贈給《焦點訪談》編輯記者四句話」，刊於1998年10月8日，《人民日報》。
17. 十六大後，胡錦濤如此要求中央電視台，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關於進一步改進會議和領導同志活動新聞報道的意見》時重申此要求。此材料於2005年10月，以下網址獲得：<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6/20030328/957012.html>。

18. 源自「中國靜悄悄的革命」，2003年3月刊於*Asia Times Online*。2005年11月從以下網址獲得：<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EC11Ad02.html>。
19. 題為「堅持『三貼近』要著重解？五個問題」的文章於2003年5月16日刊登於《求是》。《求是》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黨刊 (<http://www.qsjournal.com.cn/>)。2005年10月在以下網址獲得：[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5/20/content\\_878286.htm](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5/20/content_878286.htm)。
20. 源自「中國媒體出現新局面」，2005年8月22日刊於*China Daily*。2005年12月在以下網址獲得：[http://www.chinadaily.com.cn/en/doc/2003-08/22/content\\_257190.htm](http://www.chinadaily.com.cn/en/doc/2003-08/22/content_257190.htm)。
21. 如上。
22. 2003年，孫志剛，一名在廣州工作的民工，由於沒有隨身攜帶身份證而被帶入收容所拘留。在那裏，他被毆打致死。《南方都市報》曝光了這一血腥事件，最後導致了憲法修訂了收容條例。相關信息可參見以下網址的「南方都市報對孫志剛案的報道」：<http://www.hrw.org/campaigns/china/beijing08/sun.htm>。
23. 參見“The Winding Road: Journalists struggle for press reform in China”，刊於*Global Journalist*。2005年12月於以下網址獲得網絡版文章：<http://www.globaljournalist.org/magazine/2005-1/china-press.html>。
24. 參見《衛報》文章：“Publish and be damned”，2004年4月16日刊於*Guardian*，2005年12月在以下網址獲得：<http://www.guardian.co.uk/elsewhere/journalist/story/0,7792,1193529,00.html>；亦可參見“Beijing paper’s staff strike after editor’s removal”，2005年12月31日刊於*Guardian*，2005年12月在以下網址獲得：<http://www.guardian.co.uk/international/story/0,3604,1675736,00.html>。
25. 調查由北京青年報調查新聞工作室友邦諮詢有限公司2003年執行。
26. 源自報道「當記者挺危險的」，2005年11月8日刊登於《北京青年報》。
27. 如前文所提及，《新京報》是一張典型的自由報紙，其以調查新聞和獨立報道聞名。這份報紙於2003年11月由廣州的《南方都市報》和北京的《光明日報》聯合在北京創刊。《南方都市報》負責資金注入以及採編配置，而《光明日報》向《新京報》提供了刊號。
28. 引用自新華網。2005年11月從以下網址獲得該資料：[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3-11/13/content\\_1176812.htm](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3-11/13/content_1176812.htm)。
29. 2005年12月28日，該報總編和副總編均被撤職。然而，第二天，該報員工因撤職事件進行罷工。12月30日，該報副總編復職。
30. 引用自「新京報地震」，刊於2005年12月29日《聯合早報》。2005年12月在以下網址獲得：[http://www.zaobao.com/gj/zg051229\\_501.html](http://www.zaobao.com/gj/zg051229_501.html)。

31. 《聯合早報》的報道揭示了兩類可能的原因。一是《新京報》因為調查報道，特別是定州事件報道，惹上麻煩，引起有關部門的不悅。二是《南方都市報》和《光明日報》集團之間利益分配引起。而BBC報道指出當權者的不悅是主要因素。引用自「100名新京報員工抗議總編被撤職」，刊於2005年12月29日BBC世界報道，2005年12月在以下網址獲得：[http://news8.thdo.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4560000/newsid\\_4568700/4568704.stm](http://news8.thdo.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4560000/newsid_4568700/4568704.stm)。  
引用自「中國記者抗議審查：總編輯被撤職引發北京報紙記者罷工」，刊於2005年12月31日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32. 引用如上。
33. 源自深度訪談以及田野調查。
34. 源自田野調查。
35. 源自深度訪談以及田野調查。
36. 此處，為了保護記者，我刪去其原文題目、涉及人員以及機構名稱。